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袁枚与随园诗话

王英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袁枚与随园诗话

王英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这套丛书是向中等以上文化程度的读者介绍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知识，内容包括文学史上比较有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重要的文学活动和文学流派，以及文学体裁方面的基本知识。丛书的编写力求观点正确，内容充实，叙述简明扼要，文字通俗易懂。

中国古典文学基本知识丛书

袁枚与随园诗话

王 英 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十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1/32 印张 5.375 插页 2 字数 85,000

1990 年 4 月第 1 版 199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325-0599-5

I·354 定价: 2.50 元



袁枚像

目 次

一、袁枚的生平	1
二、袁枚的思想	12
三、袁枚的诗歌创作	20
真性情诗	21
讽谕诗	35
山水景物诗	46
四、《随园诗话》概说	57
五、《随园诗话》的性灵说诗论	61
真情论	62
个性论	85
诗才论	102
六、《随园诗话》的采诗	123
采诗的原则	124
采诗的内容	134
七、《随园诗话》的记事	143
八、袁枚的地位与《随园诗话》的影响	154

一、袁枚的生平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一号存斋，因居于江宁（今南京）小仓山随园，世称随园先生，晚年自号仓山居士、随园老人、仓山叟。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祖籍浙江慈溪。其祖父名琦（qí 其），字旦釜，为明代槐眉之孙，槐眉与其父茂英有《竹江诗集》行世^①。祖母柴氏。父袁滨、叔袁鸿，皆因生活贫困而游食四方，依人作幕府。母亲章氏，为杭州瞿（qí 其）士章师禄次女^②。

袁枚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月二日诞生于钱塘县东园大树巷^③。嘉庆二年（1797）十一月十七日卒于小仓山随园^④。综观袁枚一生行状，可明显划分为三个时期：康熙五十五年至乾隆四年

①参见《随园诗话》（下简称《诗话》）卷二。 ②参见袁枚《诗话》卷二、《子不语》、《先妣章太孺人行状》、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 ③参见方濬师《随园先生年谱》、袁枚《小仓山房诗集》（下简称《诗集》）卷二十八《余生东园大树巷中，周辟迁居，今六十五年矣，重过此地》。 ④见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

(1716—1739)为学习与求仕时期；乾隆五年至十三年(1740—1748)为步入仕途与从政时期；乾隆十四年至嘉庆二年(1749—1797)为归隐赋闲与集中精力创作著述时期。

袁枚于乾隆文坛素有“奇才”、“豪才”、“才子”之目，与赵翼、蒋士铨并称三大家。赵翼曾题袁枚诗册云：“八扇天门跌(diē 迭)荡开，行间字字走风雷。子才果是真才子，我要分他一斗来！”^①乾隆著名诗人黄景仁亦赠诗云：“一代才豪仰大贤，天公位置总天然。”^②这固然与袁枚“幼有异禀”^③，天分较高有关；但主要是袁枚自幼即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及其本人刻苦学习所致。袁枚幼年颇得益于祖母照顾与孀居姑母的教诲，他在《随园老人遗嘱》中追忆道：“我年八岁，祖母犹抱卧怀中，沈氏姑母教之读书识字，料理起居服食。”《秋夜杂诗》^④亦云：“我年甫五岁，祖母爱家珍，抱置老人怀，弱冠如闺人。其时有孀姑，亦加鞠((jū 居)育恩，授经为解义，嘘背分余温。”姑母因侄儿好听古事，所以常挑选史书、笔记中通俗易懂的内容娓娓不倦地讲解给他听，使小袁枚五岁时就已略知汉、魏、唐、宋国号与人物；同时还教他朗读《尚书》佚

①《诗话》卷十引。 ②《己巳仲秋赋呈简斋先生》。

③澄清堂稿《故江宁县知县前翰林院庶吉士袁君枚传》。 ④《诗集》卷十。

屈聱牙的《盘庚》、《大诰》，使他初涉文史知识的殿堂^①。

康熙六十一年(1722)袁枚七岁，开始接受正式教育，跟随杭州史玉瓚先生读《论语》、《大学》，打下了古文根柢^②。但由于家贫书少，袁枚幼年“除‘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直到九岁时，才偶然看到其师友人张自南的一部《古诗选》，如获珍宝。此诗选始于《古诗十九首》，终于盛唐，袁枚乃“吟咏而摹仿之”，此为其“学诗所由始也”^③。袁枚后来还回忆道：“九岁读《离骚》，嗜古有余慕。学为四子文^④，聪明逐陈腐。犹复篝残火，偷习词与赋。”^⑤这表明袁枚自幼喜学诗赋而厌恶八股文。袁枚于诗赋可谓无师自通，自学而成。他九岁时曾随人游杭州吴山，登高望远，诗兴大发，即景吟成五律一首。其中一联云：“眼前两三级，足下万千家。”后来他重游吴山忆及此联诗句，仍“觉童语终是真语”^⑥。诗人渴求知识，爱书如命，其《对书叹》^⑦云：“我年十二三，爱书如爱命。每过书肆中，两脚先立定。苦无买书钱，梦中犹买

①参见袁枚《亡姑沈夫人墓志铭》，《小仓山房文集》（下简称《文集》）卷五。

②参见袁枚《史先生墓志铭》，《文集》卷五。

③参见《诗话》卷六。

④四子文：即八股文，明清科举考试的文体之一。

⑤《途中寄金二质夫》，《诗集补遗》卷一。

⑥《诗话补遗》卷六。

⑦《诗集》卷三十二。

归。至今所摘记，多半儿时为。”这真切的叙述告诉人们：“才子”之奇才并非与生俱来。雍正五年（1727），袁枚十二岁为秀才，受知于学使王交河先生。他更加孜孜不倦地学习文章。十四岁尝秉姑训作《郭巨埋儿论》，抨击封建礼教，胆识不凡。雍正十二年（1734），袁枚十九岁，改在杭州敷文书院，受业于杨绳武先生^①；尝呈所作《郭巨》、《高帝》二论求教，杨氏批曰：“文如项羽用兵，所过无不残灭。汝未弱冠，英勇乃尔！”^②评价甚高。袁枚倍受鼓舞，益发愤为文，故其《万松书院》^③记云：“当时杨夫子，经史腹便便。……我每遇文战，彻夜穷钻研。至今咳(kài)唾处，心血犹红鲜。”

乾隆元年（1736），袁枚二十一岁，赴桂林探望叔父于广西巡抚金鉞幕中。途中所作诗为《小仓山房诗集》之始。金鉞见袁枚相貌不俗，欲试其文才，乃命作《铜鼓赋》。铜鼓为古代南方少数民族的一种乐器，鼓身有花纹缠绕，有人附会为诸葛亮所创制，故一名诸葛鼓。袁枚提笔立就，才气横溢，甚为瑰丽。金氏大奇之。时逢乾隆诏举博学鸿词之士，金氏特为袁枚奏疏力荐，称其年仅二十一岁而贤才通明，应此选十分合适，“语多溢美，天

①《诗话补遗》卷八：“杨文叔，讳绳武，癸巳翰林，丰才博学。” ②方濬师《随园先生年谱》引。 ③《诗集》卷二十六。

下骇然，想见其人”，以至广西不少士子“惊来问讯”^①。当时海内征士二百余人，而袁枚年最少。袁枚对金氏非常感激，晚年曾称金公为“六十年来生平第一知己”^②。袁枚北上京师，文士胡天游初见之即叹曰：“美才多，奇才少，子奇才也。年少修业而息之，他日为唐之文章者，吾子也。”^③但因为袁枚“自少不好作四书文，虽入学，虽食饩(xì 戏)，虽受荐于房考，而心终不以为然。心之所轻，烟墨知之，遂致得题握管，不受驱使，四战秋闱，自不惬意，不敢有闵于有司”^④。这次在京参加博学鸿词试仍落选。但年轻的袁枚已名声鹊起，崭露头角。

袁枚在北京结识了胡天游、张鹭洲、唐荻村等人，经友人推荐至稽相国家当家庭教师，教其幼子承谦^⑤；同时为了应付科举考试，“不得不降心俯首，惟时文之自攻。又虑其不专也，于是忍心割爱，不作诗，不作古文，不观古书……半年后于此道小有所得”^⑥。乾隆三年（1738）袁枚二十三岁时，终于考中举人，次年又一鼓作气中进士，选庶吉士，入翰林院，可谓否极泰来。

上述为袁枚生平之第一时期。

①参见袁枚《广西巡抚金公神道碑》，《文集》卷三。 ②《随园老人遗囑》。 ③袁枚《稚威哀词》，《文集》卷十四。 ④《与甫之秀才第二书》，《文集》卷三十五。 ⑤参见《诗话》卷三。 ⑥《与甫之秀才第二书》。

乾隆四年冬，袁枚乞假还乡，与王氏完婚。次年从杭州回北京，时刑部尚书史贻直（敬弦）任翰林庶吉士教习，袁枚“习国书免课”^①，攻读满文。至乾隆七年（1742），袁枚满文考试却最下等，这样在翰林院就难以跻身了。鄂文端公（尔泰）对他说：“观汝壮貌，天子必用汝，汝为外吏，必职办；或忧汝能文，不任吏事，非知汝者。”^②同年，袁枚即外放江南任县令。袁枚“本以文章入翰林有声，而忽摈外”^③，未免心中黯然，而有“三年春梦玉堂空”^④之叹，写下了《落花》^⑤等诗寄寓“薄命”之哀。袁枚先任江苏溧水县知县，“敏而能断”，颇有政绩；当他迎养父亲于溧水时，“父疑子年少无吏才，试匿名访诸野，皆曰：‘吾邑有少年袁知县，乃大好官也！’父喜，乃入官舍。”^⑥不久，袁枚又调任江浦县、沭阳县知县。其间写下了《苦灾行》、《征漕叹》^⑦、《捕蝗谣》^⑧等反映民生疾苦之作。乾隆十年（1745）袁枚移知江宁县直至十三年（1748），政绩亦很多。为此袁枚平生又一知己、两江总督尹继善曾荐举他为高邮州刺史，但吏部驳下未准。

①袁枚《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文集》卷三。

②袁枚《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文集》卷八。

③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④《改官白下留别诸同年》，《诗集》卷三。

⑤见《诗集》卷三。⑥参见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

⑦均见《诗集》卷三。⑧《诗集》卷四。

袁枚于乾隆十三年乃乞养归山。考其退出仕途的真正原因当有二：一是擢升无望，而又深恶县令之职整日忙于应酬，如同大官之奴，苦不堪言：“苦吾身以为吾民，吾心甘焉耳；今之昧(meì 妹)宵昏而犯霜露者，不过台参耳，迎送耳，为大官作奴耳。彼数百万待治之民，犹齁齁(hōu hōu)熟睡而不知也。”①二是想专心埋头文学创作。他认为“功业报国，文章亦报国”，“但使有鸿丽辨(辩)达，蹕(chūo)绝古今，使人称某朝文有某氏，则亦未必非邦家之光。仆官赤紧以来，每过书肆如渴骥见泉，身未往而心已赴，得少休焉，重寻故物，或未干贤者之讥乎？”②此年袁枚曾以三百两银子购得江宁织造曹颉(tiào 跳)后任隋赫德之旧“隋织造园”，改治为“随园”，称“以一官易此园”③。辞官后居于此并加修治。《随园记》记曰：“茨(cí 词)墙剪园，易檐改涂。随其高，为置江楼；随其下，为置溪亭；随其来涧，为之桥；随其湍流，为之舟……比随其丰杀繁瘠，就势取景，而莫之夭阏(è 饿)④者，故仍名曰‘随园’，同其音，易其义。落成，叹曰：‘使吾官于此，则月一至焉；使吾居于此，则日日至焉；二者不可得兼，则舍官而取园者也。’”袁

①《答陶观察问乞病书》，《文集》卷十六。 ②《再答陶观察书》，《文集》卷十六。 ③《随园记》，《文集》卷十二。 ④夭阏：遏止。

枚终于舍官取园，在小仓山过起悠闲自在的生活。

这是袁枚生平的第二个时期。

此后近五十春秋，除乾隆十七年(1752)三十七岁曾一度“改官秦^①中”^②不到一年外，袁枚终生绝迹仕途。他之所以曾短期出山赴陕西任职，乃是迫于“贫”与亲友舆论的压力，并非心甘情愿^③。因此他一旦发现自己与陕西总督黄廷桂“臭(xiù 锈)味差(cī)池”，就“上书万余言，不省，遂乞病归”^④。袁枚于赴陕途中曾写了不少北方景物诗，此乃意外的收获。乾隆十八年(1753)由陕西回南京后，袁枚继续治理随园，并由杭州迎养其母，迁家于南京，乾隆二十年(1755)移家入随园定居。袁枚于随园或与诗友聚会，或埋头著述，悠哉游哉。

袁枚在乾隆诗坛被视为“当代龙门”^⑤。他颇以提携后学为己任，“对后生少年一言之美，称之不容口”^⑥。他撰写《随园诗话》，一是旨在倡导性灵说诗论，一是借以鼓吹时人佳作，奖掖后学。此外，袁枚广收门生弟子，“方外缁(zī 资)流”^⑦，青衣

①秦：陕西。 ②《先妣章太孺人行状》，《文集》卷二十七。

③参见《杂诗八首》之三，《诗集》卷七。 ④王昶《湖海诗传·蒲褐山房诗话》。

⑤《答和希斋大司空》附和希斋诗，《诗集》卷三十五。 ⑥《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五。

⑦方外缁流：指和尚道士。方外，超然于世俗礼教之外，后用以称僧道。缁，黑色，中国僧徒多穿黑衣，故亦称“缁流”。

红粉，无所不备”，因此王梦楼曾赠诗云：“佛法门墙真广大，传经直到郑樱桃^①。”^②这是对袁枚培育诗才特别是女诗人的赞扬。按照封建陈腐观念，“女子不宜为诗”，对此袁枚驳斥道：“陋哉言乎！圣人以《关雎》、《葛覃》、《卷耳》冠三百篇之首，皆女子之诗。”^③因此他“广收女弟子三十余人”^④，并在《诗话》中博采闺秀之作而宣扬之。章学诚等人曾攻讦袁枚收女弟子事，实属道学腔调，于袁枚无损。袁枚对于穷困而有诗才的寒士，亦时有解囊相助，鼓励其用心作诗之举，显示出一片火热心肠。

袁枚居随园而常出游，往返于南京与扬州、苏州、杭州之间。他更有几次远游，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乾隆四十七年（1782），袁枚六十七岁出游浙江，欣赏天台山国清寺至高明寺一带山色，惊叹雁荡山大龙湫的奇观。次年又游安徽黄山，感叹黄山松的奇姿与厄运。乾隆四十九年（1784）二月又有岭南之游，顺路游览了江西庐山、小姑山等名胜，遍游了罗浮山、新会、广州；九月又由广东赴桂林，登独秀峰，游漓江水；离桂林返回途中，又到湖南衡山游览。乾隆五十一年（1786）袁枚七十一

①郑樱桃：东晋列国后赵石虎所宠爱的优僮。 ②《诗话补遗》卷九。 ③《诗话补遗》卷一。 ④袁祖志《记翰墨》。

岁，又远足福建武夷山，攀行于渔梁道上。五十七年(1792)七十七岁的袁枚又重游天台山。六十年(1795)袁枚八十高龄仍游兴未减，徜徉于东南一带名胜之间。老诗人行万里路，得江山之助，写下了大量优美的山水风景诗。

嘉庆二年(1797)袁枚八十二岁，患痢，愈而复发，自知来日无多，乃作《病剧作绝命词留别诸故人》^①、《再作诗留别随园》^②绝笔诗，曰“天教袁丝亡此日，人知宋玉是前身”，“转眼楼台将诀别，满山花鸟尚缠绵”，于农历十一月十七日病卒。葬于小仓山北^③。

袁枚主要著述计有：《小仓山房文集》三十五卷，《小仓山房外集》(骈文)八卷，《小仓山房诗集》三十七卷、《补遗》二卷，《随园诗话》十六卷、《补遗》十卷，《小仓山房尺牍》十卷，《随园随笔》二十八卷，《新齐谐》(又名《子不语》)二十四卷，此外还有《袁太史稿》(八股文)、《牍外余言》、《随园食单》等，真是“著作如山，名满天下”^④！这些著作印行后，“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市井负贩，皆知贵重之”，连“海外琉球”亦有“来求其书者”^⑤。

袁枚身后毁誉交半。袁枚生活放浪，人品亦

①②《诗集》卷三十七。 ③参见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 ④钱泳《履园谭诗》。 ⑤参见姚鼐《袁随园君墓志铭并序》。

大有可指摘之处。但作为一个封建文人，其哲学思想、伦理观念等皆有高出时俗而值得称道之处。

二、袁枚的思想

袁枚生活的时代为康熙后期与雍正、乾隆年间,当时由于国内各民族的抗清浪潮基本平息,出现了所谓“康乾盛世”的相对稳定局面,社会经济又重新恢复发展,资本主义因素亦随之活跃。在东南沿海手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苏、杭一带,商品生产有较大发展,手工业如丝织、棉织、造纸、制茶、瓷器、矿业、冶炼等大有超过明末的趋势。这样,城市也日益繁荣,如袁枚所在的江宁的丝织业于乾、嘉年间即享有“江绸贡缎甲天下”之誉,人口也增至八万余户,四十余万人^①,市民队伍日益壮大。

清代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活跃与市民阶层的扩大,是推动进步思潮发展的重要动力。这表现在以明末李贽为代表的反对唯心主义理学的斗争传统在清代先进思想家的身上进一步发扬光大。清统治者为了加强思想控制,大力推行程朱理学,

^①参见戴逸主编《简明清史》卷一。